
我的奥林匹克岁月

基 拉 宁 著
张明德 刘青青 译

人民体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济民

刘丹梅

技术设计：法 迪

我的奥林匹克岁月

基拉宁 著 张明德 刘青青 译

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

·联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36开 字数130千 印张 $7\frac{8}{32}$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统一书号：10015·21 定价：1.95 元

目 录

第一章	火炬在莫斯科熄灭.....	1
第二章	国际奥委会：发展和职责.....	6
第三章	步入奥林匹克.....	18
第四章	小国出风头.....	25
第五章	南非.....	30
第六章	初尝暴力的滋味.....	45
第七章	当选主席.....	54
第八章	慕尼黑谋杀.....	63
第九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第三世界.....	72
第十章	妇女和奥林匹克运动.....	81
第十一章	职业和业余.....	87
第十二章	风云多变.....	96
第十三章	中国和其他政治难题.....	104
第十四章	啊，上帝！啊，蒙特利尔！.....	115
第十五章	礼宾和仪式.....	130
第十六章	钱，钱，钱.....	135
第十七章	比赛中使用药物.....	142
第十八章	传播和报道.....	149
第十九章	莫斯科：通往奥运会之路.....	156

第二十章 莫斯科：阿富汗问题.....	193
第二十一章 莫斯科：最后的路程.....	180
第二十二章 回到都柏林.....	214

第一章 火炬在莫斯科熄灭

1980年8月3日，我在莫斯科结束了自己主持的最后一届奥运会。巨大的中央列宁体育场内聚集着十万人。这是一个晴朗的美好之夜，但是，白天已经过去了。当我走出包厢，穿过跑道，踏上讲坛的台阶准备发表讲话时，探照灯那长长的、令人沉闷的光柱一直在照射着我。运动员和官员们聚集在体育场中央，参加国的国旗和奥林匹克运动的旗帜到处飘扬。然而，在这种浩大的场面之中，我却不由地感到了一种孤独。在担任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IOC）主席八年以后，我要告别了。

在我结束讲话之后，火炬在奥运会会歌声中熄灭了。奥运会会旗从主旗杆上徐徐落下，由八位身穿制服的男子平举着离开体育场。五响礼炮在体育场内回荡，合唱队放声高唱。

我回到总统包厢，苏联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也在那里就座。这是这位重病缠身的总理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我们一起注视着旗手和运动员们走出体育场。

这时，显示屏幕上现出了本届奥运会吉祥物小熊

米沙的形象，它代替了慕尼黑奥运会的小猎狗瓦尔第和蒙特利尔奥运会的海狸阿尼克。米沙向人们挥手告别，它的左眼淌出了泪水。

米沙体现了奥运会结束时人们的依依惜别之情，我感到自己也要落泪了。政治家们试图利用体育运动和运动员来实现他们靠政治、外交和经济手段所难以达到的目的。我痛苦地回忆起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制止美国奥运会代表队参加比赛的决定，马尔科姆·弗雷泽总理试图强迫澳大利亚奥委会抵制本届奥运会的尝试，以及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让英国队留在国内的命令。英国队和澳大利亚队最终还是到莫斯科来了，但是奥运会已经遭到了破坏。

我在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期间遇到的百分之九十五的问题都涉及到国内和国际政治。我在八年任期内所经历的危机比我的前任埃弗里·布伦戴奇二十年里遇到的还要多。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期间，以色列运动员遭到杀害。当时我是新当选的国际奥委会主席，在这届奥运会结束后即将赴任。在1976年以前的两年里，蒙特利尔奥运会曾使我大伤脑筋。首先，我怀疑体育设施届时能否一切就绪，其次，加拿大总理皮埃尔·特鲁多在最后的时刻拒绝让台湾参加比赛。最后，非洲和其他一些国家抵制了这届奥运会，理由是新西兰橄榄球队在那一年曾与南非比赛。显然，如同以往一样，政治“介入”了体育。我们生活中的一切都受到政治决定的制约。我们享有不同程度的自由，但这种自由是政治决定赋予的。体育界需要的是政治家的兴趣和支持，而不是他们的干涉。

莫斯科的情形有所不同。如果抵制取得成功，它将毁掉奥林匹克运动。抵制终于没有成功，但是谁也没有取得胜利，政治家们也丢了脸。许多运动员失去了自己仅有的一次在世界上最重大、最富于挑战性的体育比赛中竞争的机会。就运动会而言，虽然它的组织工作非常出色，但基调却是悲伤的，许多人没有参加，参加的人也充满了忧虑。

在体育比赛尤其是奥运会中，利用某一国家政治上的不端之举来为惩罚行为辩护从来都具有双重的含义。苏联人声称，他们是被“请”到阿富汗去的；1970年，正当美国在中东卷入之时，1976年冬季奥运会的主办权被授予了丹佛（后来丹佛取消了申请）。谁又知道下届奥运会1984年在美国举行时国际形势将会变得怎样呢。可以有各种理由来说服政治家们不要把体育作为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这些理由不仅是充分合理的和现实的，也是符合道德的。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发起人皮埃尔·德·顾拜旦男爵曾经写道：“体育运动可以激发最高尚或是最邪恶的欲望；……人们既可以利用它巩固和平，也可以利用它准备战争。”支持抵制奥运会的那些政府显然是在利用莫斯科奥运会——但是，它们的目的何在，要达到什么结局呢？许多未能参加的运动员至今仍在对禁令耿耿于怀。抵制在体育运动的左翼和右翼之间制造了分裂。人们被迫对毫无兴趣的事情表明自己的立场。

莫斯科奥运会的危机不仅影响了运动员和各国国家奥委会，还在它们的支持者之间制造了令人不快的

分裂。为了不冒犯政府，许多大公司中止了对本国奥委会的资助。出于相反的原因，英国的一些工会组织发起了专门的募捐活动。对于一项大众化的运动来说，这真是一种不幸的事。

但是这届奥运会还是举行了。在它结束后的第二天，我向将要接替我的西班牙的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递交了一把象征性的钥匙。随后，我怀着一种巨大的解脱感飞回爱尔兰。自上一年圣诞节以来由阿富汗问题所带来的紧张终于结束了。

我还回忆起担任主席期间的许多称心如意的事。其中最重要的是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奥林匹克运动并看到它的运动员参加普莱西德湖的比赛，尽管在我任职期间，他们没有同来自台湾的中国人比赛过。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双方都没有去莫斯科。

使国际奥委会保持良好的财政状况，这一直是我的宿愿。在慕尼黑奥运会以前，我们全靠预付的电视转播合同费得以维持。那时我的职务是高级副主席。到我退休的时候，由于普莱西德湖奥运会和莫斯科奥运会的收入以及洛杉矶奥运会的预付款项，国际奥委会已经赢利了。它的资产在1972年12月为2 084 290美元，到1980年12月已达45 142 752.21美元。在我的继任者任职期间，数字还在上升。

此外，我还促成了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的工作开展。我不遗余力地警告说，药物、输血和“两性人”（这种观念与奥林匹克的为了全体真正人类的理想完全背道而驰）会给体育运动和运动员本人带来危险。

我也回忆起自己的失败。我曾想把奥林匹克的比赛项目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但结果还是扩大了。我愿看到在自己的任期内有妇女被选入国际奥委会，但这种幸事却是在我的继任者的任期内实现的。还有，我承认，在试图阻止奥运会精神过于民族化方面，我是完全地失败了。

我回忆起这八年中的令人惬意之事——结交朋友，各地访问，以及在令人愉悦的气氛中获得各种第一手知识。我特别想起了作为奥林匹克服务对象的运动员们，当政治家操纵体育时，他们是受害者。

我的前任曾经说过，奥运会是“当代最伟大的社会力量。”它确实是一支力量，一支不可随意左右的力量。

第二章 国际奥委会：

发展和职责

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工作方式是一个最大的谜：如何工作，由谁进行以及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一个组织的权力竟掌握在一些由“非民主”方式产生的人士手中，这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现在似乎是难以想象的。国际奥委会拥有最高权力和权威。皮埃尔·德·顾拜旦男爵1894年恢复奥运会并创建这个机构的目的是要保证奥运会的各项工作得以顺利执行，并维护奥林匹克运动的原则和规章。国际奥委会的成员都是这个机构中的托管人。托管权是顾拜旦思想的中心。当然，奥委会成员并非总是要按照他的意志来行使这种权力。

国际奥委会是自我选举、自我存在的机构。它是一个俱乐部式的团体，其成员都是接受聘请加入的，每个国家只有一或两名委员，例外的情况很少。世界上半数以上的国家实际上并没有委员。奥委会委员不是本国派驻国际奥委会的代表，而是国际奥委会在委员所在国家或地区的代表。

象我这样的自由派人士以及来自共产党集团的委员们如何能够容忍这样一种制度，这个问题使许多人

感到不可思议。我想，我们都将这样回答（当然可能出于不同的原因），即逃避行使奥林匹克运动所赋予的责任是不光彩的。

当顾拜旦1894年6月23日在巴黎的索邦把体育界知名人士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它只有三十一岁。在此之前的十年中，他一直在为恢复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而奔波。人们曾希望他能承袭家传，成为一名职业军人，但他没有这样做。他从早期的政治生涯转向以一种更实际的方式来救助自己的祖国。出于对法国青年身体状况的关切，他把本国对体育运动的态度与英国、德国、瑞典和其他欧洲国家体育运动的状况进行了比较。

大学的知识界从来都反对英国式的体育运动，因此，顾拜旦选择索邦作为会址，实在使人们大惑不解。但是事实证明，选择的地点是非常出色的。来自十二个国家的七十九名代表以及四十九个体育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为了创造一种适当的气氛，在会议开始的时候，演唱了专门为这次会议谱曲的“阿波罗颂”。在顾拜旦的事业中，礼仪一贯举足轻重，一切都要安排得尽善尽美。

自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于1896年在雅典举办以来，国际奥委会一直拥有控制和发展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之权。国际奥委会起初是一个相当非正式的机构。顾拜旦以英国的亨利皇家赛船会作为样板——该机构由一个管理委员会负责，其中的官员（服务人员）都是聘请的。这个赛船会从十九世纪后期以来一直没有发生过重大变化，这一点和国际奥委会大不相同。

它的素质和效率是值得奥林匹克运动不断学习的榜样。国际奥委会在初期有十五名委员，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已增加到四十九名。现在，委员人数有八十余名。奥委会总部在1915年之前一直设在巴黎，后来，顾拜旦移居瑞士洛桑，总部也随同迁往，并一直保持至今。

国际奥委会初期时的简易体制具有许多长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在处理纷纭复杂的问题方面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了。这些问题包括其他体育组织提出的要求，奥运会举办城市的申请，要求加入奥运会比赛项目的申请，以及已有比赛项目要求增加单项，等等。此外，还包括对电视台的需求，电视转播的竞争以及商界、工业界在与奥林匹克运动会合作中所能得到的好处，等等。

除了国际奥委会之外，在奥林匹克大家庭中还包括各国国家奥委会、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和举办城市。每一成员国都应有自己的国家奥委会，并由它选派代表队参加奥运会。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则负责奥运会各个项目的比赛，目前一共有一百五十多个各国国家奥委会，它们最近成立了自己的世界性机构并有若干地区性机构。奥运会比赛项目共有二十九个。目前正值筹备期间，已有四个城市的举办申请（即洛杉矶和南斯拉夫的萨拉热窝申请举办1984年奥运会，南朝鲜的汉城和加拿大的卡尔加里申请举办1988年奥运会）得到认可并正在同国际奥委会进行磋商。在过去的五十年中，所有这些机构无论从程序上还是从实力上都发展壮大，只有国际奥委会直到最近才发生了

变化。就这种发展壮大的性质而言，它是指把国际奥委会的相当一部分职责交给了奥林匹克之内或之外（如电视台）的各种机构。有些机构并不象国际奥委会所希望的那样热衷于坚持奥林匹克的原则。这就好象拔河比赛一样，有时国际奥委会看上去成了毫无希望的失败者，然而，不管发生什么变化，不管其他个人或组织如何违背奥林匹克规章，顾拜旦最初关于托管权的思想必须要坚持下去。这是奥林匹克力量的最终源泉。

国际奥委会最主要的行政职责是选择奥运会的主办城市，保证它们遵守奥林匹克规章，认可并支持各国国家奥委会和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权益，挑选国际奥委会的新委员，以及就电视转播权问题进行谈判，等等。

国际奥委会的宗旨主要包括：

鼓励组织和发展体育运动和体育竞赛；

以奥林匹克精神激励体育运动，进而促进和加强各国运动员之间的友谊；

保证按期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

使奥运会无愧于它的光荣历史和促成其恢复的高尚理想。

国际奥委会宪章第三条规则规定：

奥运会每四年举办一次。它团结各国的奥林匹克竞赛者参加公正和平等的竞赛。

国际奥委会将保证奥运会拥有最广泛的观众。

不允许以种族、宗教或政治为理由对任何国家或个人进行歧视。

国际奥委会主席拥有巨大的权力。由于委员会会议在奥运会之间每年只举行一次或两次，因此，有关实行政策的大量的日常工作都由主席掌握，由奥委会干事在洛桑威第堡的总部负责执行。执委会是制订政策的机构，它每年举行二至三次会议，国际奥委会委员拥有最终裁决权，除了执行某些特殊任务时以外（国际奥委会经常执行这样的任务），他们可以否决主席的决定。

挑选新委员的工作主要由奥委会主席和执委会负责，他们的提名很少遭到公开反对。另一方面，主席和执委会也是由国际奥委会选举的。除辞职、退休或死亡外，委员可以终身任职。主席的任期为八年，可以重新当选，每期四年。由于这种连选连任制，布伦戴奇曾担任主席达二十年之久。我一直声明自己只就任一届八年。我认为，两届奥运会之间的时间足以使奥委会主席看到上届运动会中的问题并在下届予以补救。否则，在位就过长了。

执行委员会委员经提名并得到附议后产生，实行缺额选举。执委的法定任期为四年，但如果他在任期的第一年内去世或晋升（如晋升为主席或副主席），可再选举一名执委补缺直至届满，并可作为下届执委会候选人。这样，执委会委员最长可能任期七年。

遗憾的是，这些规则并没有得到严格遵守。所有委员都必须讲英语或法语这一条件在1951年（我入选的前一年）就曾受到漠视。这一年当选并获批准的第一位苏联委员康斯坦丁·安德利亚诺夫只能讲俄语，他不得不带一名翻译。安德利亚诺夫是国际奥委会的

一名忠实成员，但是他的语言限制无疑是一个欠缺。他的私人译员的出现代表了一种关键性的变化。

在我担任委员的初期，总部的工作人员只有一位兼职管事奥托·迈耶和一位兼职秘书。迈耶开设洛桑唯一的一家珠宝店并经管国际奥委会的事务。当时的总部就设在珠宝店的后屋，还有邻门旅馆的酒吧。现在，由于任务繁琐复杂，来自各国的工作人员已增加到三十多人。虽然法语和英语仍然是唯一的正式语言（法语更为优先），但西班牙语、俄语、德语和会议主办国语言也在国际奥委会的全体会议上使用，带有同声传译。这种不可避免的语言多样化微妙地改变了奥委会会议的特色。讲法语和英语的人可以通过语调和各种其他各种细微变化用外交辞令表达自己的含义，而这一点通过译员往往是难以做到的。委员会的辩论由于使用译员而变得脆弱了，尽管这些译员作了最大的努力。这种辩论从来就不是高水平的。

最近几年以来，国际奥委会碰到了许多需要专门知识的技术问题，如医药、电视、新闻等。为此，成立了由各方面专家和国际奥委会、各国国家奥委会和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中的一些成员组成的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的建立为奥运会积累了各个方面的详细资料。

奥林匹克规章规定，每个国家在国际奥委会中只能有一名委员，但大国、奥林匹克运动的积极参加国以及奥运会主办国可以至多有两名。实际上，在我最初当选的时候，许多国家——包括英国、法国、美国和中国——都拥有三名委员。按照规章，国际奥委会

委员不得接受本国政府的指示，任何组织和个人也不得以任何方式约束国际奥委会委员或干涉其投票的独立性。由于这个原因，最早的委员都是拥有独立资产的人士，虽然资产独立并非一贯意味着思考独立。

国际奥委会曾被描述为“世界上最排外的俱乐部”。在我于1952年入选时，国际奥委会中包括一位国家元首（列支敦士登执政的弗朗西斯·约瑟夫亲王二世），三位亲王（丹麦的阿克塞尔，卢森堡的吉恩斯和摩纳哥的皮埃尔）和一位大公（德国的梅克伦堡）。除此之外，还有三位伯爵，五位贵族（由于我的入选而增加到六位），三位骑士，一位帕夏（土耳其等国的高级官衔——译注），一位印度王公以及可以用“阁下”或“尊敬的”等尊称称呼的若干位高级人士。与所有俱乐部的惯例一样，这些委员自己承担费用并向国际奥委会上缴认捐费。

现在，认捐费已不复存在了，我对此深感遗憾。国际奥委会接受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和各国国家奥委会的捐助，同时支付委员们的基本旅差费，这当然是一个进步。但是，向俱乐部上缴认捐费这种纪律和义务毕竟还是应当保持的。

对挑选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工作应给予足够的评价。大多数当选的委员都是品德完善、在本国受尊重的人物。他们中的许多人曾担任过本国奥委会主席，有些曾是奥林匹克运动员或奖牌获得者。已故的埃克塞特侯爵（即伯利勋爵）在1928年的阿姆斯特丹奥运会上曾为英国夺得一枚金牌，四年以后又在洛杉矶获得一枚银牌；新西兰的阿瑟·波雷特爵士（现称波雷

特勋爵)，希腊的康斯坦丁王，美国的朱利安·罗斯福，日本的清川正二，芬兰的彼得·塔尔伯格和皮尔乔·哈格曼（她是最早的女委员之一）——所有这些人都是著名的奥林匹克运动员。

奥委会委员的继任者是由委员们自己举荐的，而且一般都能获得通过。这样一来，便在国际奥委会中形成了“家庭席位”。在我入选后的一些年里，前委员的儿子、女婿和侄子们为奥林匹克运动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这显然是危险的。

如果这些候选人都称职的话，那么，国际奥委会是不应因这种看来似乎是承袭制的体制而受到指责的。这种制度在社会和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普遍存在——无论是在左派国家还是在右派国家，也无论是在民主国家还是在极权国家。选择为人所知的人士总比与此相反要安全得多。

如果王室成员由于政权更迭而突然在本国成了不受欢迎的人，他们的委员资格就成了问题。康斯坦丁王逃离了希腊并在流亡中辞去了他的国际奥委会委员职务。由于他是奥运会金牌获得者，因此后来被任命为名誉委员。他至今仍对国际奥委会的事务深感兴趣。伊朗已故国王的弟弟古拉姆·礼萨·巴列维亲王也曾是国际奥委会委员。王朝被推翻后，他逃离了伊朗。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不知他的下落，后来我终于和他取得了联系。他也辞去了职务。

所有的国际奥委会委员都力图在民主的基础上处理事务。决议一旦形成，它对所有的人都具有约束力。没有集体责任感是不可能完成任务的。如果某位